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黄克武
编

严 复 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黄克武
编

严复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严复卷/黄克武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300-19948-1

I. ①中… II. ①黄…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②严复 (1854~1921)-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02919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严复卷

黄克武 编

Yanfu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张	33.5 插页 2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30 000	定 价	7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1840年到1949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径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隙，敬请方家指正。

开启民智 会通中西（代引言）

——严复与清末民初的历史变局

一、成长与受教阶段（1854—1879）

严复，福建侯官人，1854年1月8日出生于福州府侯官县南台区的苍霞洲，其祖厝则在福州郊外的阳岐。苍霞洲位于福州城南、闽江之北，是一个热闹的港口，有繁荣的国际贸易与多样的文化活动。严复幼年时代，除了曾短暂地搬回阳岐居住外，主要在此一口岸中渡过。他的祖父严秉符与父亲严振先（1821—1866）是当地的名医（父亲有“严半仙”之美名），熟悉儒道经典与医书，但并无科举功名，母亲陈氏（1833—1889）也来自平民家庭。严氏家族在福州属于中下层地方菁英。^①

严复从幼年时代开始，一方面成长于国际交会的海港环境，另一方面沉浸于祖父与父亲重视实际的医学传承。这对他的一生有所启迪。严复5岁开始跟随家人与几位老师读书，背诵《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1863年，当他9岁时，他的父亲聘请了当地有名的学者黄宗彝来担任其启蒙教师。在《福建通志》的“文苑”中，留有黄宗彝的一篇小传：

黄宗彝，初名燧，字圣谟，又字少岩，侯官人，自号左鼓右旗

^① 本文中所述严复的生平事迹与言论均征引自拙著：《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Max K. W. Huang, *The Meaning of Freedom: Yan Fu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Liberalism*,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8；黄克武：《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山人……幼聪颖……然屡试不售。父行贾建宁暴卒，遗篋金五千，尽没于其族父某。家人大哗，令与较。宗彝曰：以财故令吾族恶名暴于世，吾不为也。……宗彝与同里刘家谋、谢章铤交最笃，治古文有义法，尤精小学，遗诗一卷、娑娑词二卷、方言古音考八卷、杂文若干篇。^①

由此可见黄宗彝受到经学考据、古文义法之影响，此外他极重伦理道德，然并无科举功名。1865年黄宗彝过世之后，严复又跟随其子黄孟修读书，孟修秉承其父，乃“同治癸酉科拔贡，通经学、小学、史学，院试辄冠其曹，与张侍郎亨嘉齐名，顾懒不着……身后不存一字矣”^②。严复在他们的教导之下研习传统典籍，也开始喜好书法与诗词，后来写字、吟诗、作词等成为他一生的嗜好，因而留下不少墨迹。^③

1866年，严复与一位王姓女子结婚，她和严复一样，并非出身于士绅家庭。几个月之后，严复的父亲因为从病人身上感染霍乱，不幸逝世，此事对严复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父亲过世后，家庭出现经济危机，这使得严复不得不放弃科举正途，投考福州船政局刚开始兴办的船政学堂。

这所新式学校是由沈葆楨（1820—1879）在法人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 1835—1886）的协助下所创办的军事学堂，训练学生造船与驾驶，属于洋务新政中模仿西法的一部分。该校第一次入学考试于1866年冬天举行。严复参加了这场包括口试、笔试与体能测验的入学考试。其中的笔试考作文，题目出自《孟子》的“大孝终身慕父母论”，当时严复的父亲刚去世，他对此题目深有感触，结果以第一名被录取。后来严复和五四时期的许多反传统学者如陈独秀（1879—1942）、胡适（1891—1962）、鲁迅（1881—1936）等人不同，他一生都肯定儒家价值，坚持以“孝”为核心的家庭伦理观。次年初，他和一百多位其他的学生，在城中的定光寺上课，在诵经声中开始学习英文。6月，学校迁到马尾。从1867年至1871年，严复在该校驾驶学堂读书，此科目以英文为专业语言，负责人是英国人James Carroll。严复在此开始以英文修习算术、几何、物理、化学、机械等航海的课程。

① 陈衍等编纂：《福建文苑传》，见《福建通志》卷9，3下~4上页，福州，福建通志局，1922。

② 陈衍等编纂：《闽侯县志》，303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据1933年刊本）。

③ 参见卢美松主编：《严复翰墨》，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2005。

该校虽以西学为主，但同时也强调中学。严复与其他的学生必须以部分时间来学习古文，并研读《孝经》与《圣谕广训》等。很显然，对这些学生来说，他们并不感觉到中西学之间的矛盾，严复后来会通中西的理念应植根于此。不过从此开始一直到他自英国返国之间，严复学习的重心始终是西学。1871年5月，17岁的严复从该校毕业。在其后的6年间，严复在英国皇家海军 Captain Tracey 的教导下，分别在“建威”与“扬武”军舰上实习，其间曾赴新加坡、日本与台湾省各地。

严复在实习船上的表现不错，然并非顶尖。沈葆楨在1873年9月15日所写的奏折中提到表现优异的学生有张成（生卒年不详）、吕翰（1853—1884）、刘步蟾（1852—1895）、林泰曾（1851—1894）等人，严复不在其中。在日意格所写的报告上（1873年11月18日）则说严复和其他六位同学已经获得有关驾驶船只的理论知识与实务经验，有资格成为海军的一员了。日意格同时建议派遣学生出洋留学，清政府接受了他的建议。

1877年，23岁的严复和其他十一名同学被选派赴英国读书。这一群留学生在李凤苞（1834—1887）与日意格带领之下，于3月31日搭船离境，5月11日抵达英国的朴次茅斯港（Portsmouth）。两天之后，他们去伦敦会见驻英大使郭嵩焘（1818—1891，大使任期自1877年1月至1879年1月）。其后严复等学生在朴次茅斯海军基地实习了3个月，9月参加考试，结果严复被位于格林威治的皇家海军学院所录取。在英国外交部，有严复当时留下来的一份履历：

年龄：23

在福州船政学堂就读时间：5年

在实习船的时间：6年

在中国海军任职状况：担任实习船的驾驶

在英国期间：从1877年5月开始

级别：第五级船员

实习船指导者之评语：非常聪明的船员与驾驶^①

在接下来的两年间，严复在皇家海军学院求学，至1879年的夏天毕业返国。英国皇家海军学院设立于1873年，其目的是提供各层次的海军军事训练。严复在此读书时负责校务的是校长 Sir Charles Shadwell

^① General Correspondence, FO 17/768, p. 118.

与学务长 Dr. Hirst 等人。^① 有关严复留英的经历，在郭嵩焘的日记中有不少的记载。学校的东区是弹道学、工程学、科学、数学以及德国与意大利研究的专区，西区则是餐厅、教堂、博物馆等。^② 学期在 10 月开始，至次年 6 月结束。严复主修海军驾驶，上课的内容包括数学、化学、物理、机械、航海与国际关系等。就在这一段时间，严复与郭嵩焘成为忘年之交。两人第一次比较深入地交谈可能是在 1878 年 2 月 2 日，在郭的伦敦寓所举行的庆祝中国旧历年的聚会上，与严复的谈话给郭嵩焘留下了深刻印象。1878 年 5 月 30 日，郭和几位官员访问了皇家海军学院，他们到严复的宿舍参观，了解学习状况，并观看严复为他们示范的科学实验。严复还告诉郭嵩焘，他深深地为西方学术所吸引，但担心可能无法在短时间内充分掌握其精髓。1878 年的 6 月、7 月，严复随郭赴法国访问，参观了许多地方，还留下了一幅珍贵的照片，照片中他穿着清朝的官服，并留着辫子。^③

严复也在这时开始接触西方的社会、政治思想，如达尔文 (Charles Darwin, 1809—1882)、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 1820—1903)、培根 (Francis Bacon, 1561—1626)、赫胥黎 (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边沁 (Jeremy Bentham, 1748—1832)、孟德斯鸠 (Montesquieu, 1689—1755)、亚当·斯密 (Adam Smith, 1723—1790)、穆勒 (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 等人的学说。同时严复也开始观察英国社会，注意中西文化间的差异。他看到英国人从小锻炼身体，因而较为强壮，这引发了他后来对民德、民智之外，对于民力的提倡。再者，严复在观察英国法庭之后，对英国法律的执法公正印象深刻。这些经验让他了解到中国制度的缺陷，并思索未来应努力的方向。

留学欧洲期间，严复开始反省中西学之间的关系，并开始批判中国士人间颇为流行的“西学中源”论。1878 年 3 月 12 日，在英国留学的严复与当时担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讨论到张自牧 (1833—1886) 的《瀛海论》。^④ 张自牧是郭嵩焘的好友，《郭嵩焘日记》中曾多次记载两人讨

① James Russell Soley, *Report on Foreign System of Naval Education*,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80, p. 49.

② 参见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587 页，长沙，岳麓书社，1984。

③ 参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卷首附图，北京，中华书局，1986。

④ 参见郭嵩焘：《郭嵩焘日记》卷 3，444～445 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论时事、洋务，甚至一些重要的人事任命案，郭嵩焘称赞他“于洋务所知者多，由其精力过人，见闻广博，予每叹以为不可及”（1879年5月9日日记）^①，由此可见两人关系匪浅，且在积极认识西学上具有共识。在郭嵩焘出使之前，曾保举当时为“布政使銜贵州候补道”的张自牧作为二等参赞官，后张因故未能成行。严复在与郭嵩焘讨论时很直率地批评了张自牧的“西学中源”论。

严复也知道郭、张为好友，并认识到张自牧的“西学中源”论说法具有积极开拓西学的意义，张自牧借此指出不应排斥西学，且儒者应以不知西学为耻。不过严复也看到张自牧思想中对旧有观念的妥协面，他批评张自牧对铁路、机器的保守态度，以及对海防工作的忽略。由此可见严复对“西学中源”论，或借此论来接引西学的做法，早有质疑，后来他在《天演论》自序中说“必谓彼之所明，皆吾中土所前有；甚者或谓其学皆得于东来，则又不关事实，适用自蔽之说也”，可谓其来有自。

二、水师学堂任教与翻译事业的开始（1879—1900）

严复返国之后，在船政大臣、光禄寺卿吴赞诚（1823—1884）的任命下，任教于福州船政学堂。为标示这个新阶段的开始，严复将名字由“宗光”改为“复”，字几道。“复”来自《易经》，取其“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复卦）；“几道”则出自《老子》“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第8章）。上述的选择，反映出严复儒家与道家的思想倾向。次年，严复在李鸿章（1823—1901）的邀约下，从福州北上，赴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教。他在北洋水师学堂由“洋文总教习”一职开始其教学生涯。至1884年他以“教习都司”的身份，“以天津水师学堂办有成效”得到奖叙。1888年“报捐同知，双月选用”，后因功免试同知，直接以知府（从四品）选用。1889年初“奉委会办天津水师学堂事宜”，1891年升为道员（正四品），再于1893年底“委办天津水师学堂”，此后他的头衔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道员严复”。

就在此一阶段，严复开始崭露头角，以他的翻译作品与政治评论文章闻名于世。然而很多人或许不知道，他对中国的关怀与未来的构思是在苦闷、不得志的心情之下所抒发出来的。在这时期他身体状况不好、

^① 《郭嵩焘日记》卷3，855页。

沾染鸦片恶习、科举失利，又与他的同僚及直属长官李鸿章关系欠佳。

在1890年代中期，严复因不受重用，曾打算离开李鸿章阵营投奔张之洞（1837—1909），也大约在这个时期他开始沾染了吸食鸦片的习惯，一直到死前才勉强戒除。严复在1895年初写给四弟观澜的信中表示：“兄北洋当差，味同嚼蜡。张香帅于兄颇有知己之言，近想舍北就南，冀或乘时建树耳。”可惜的是，严、张两人观念有差距，尤其是严复在《直报》上发表四篇评论时政的文章后，张之洞大怒，命御史屠仁守（？—1900）在《时务报》撰文反驳。其后，严复私下称张之洞是“妄庸巨子……恐此后祸国即是此辈”，并公开反驳张的“中体西用”论。^①随后，张、严两人关系破裂，严复继续留在北洋水师学堂。

1897年严复和王修植（1858—1903）、夏曾佑（1863—1924）等在天津仿英国的《泰晤士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宣传变法维新，《天演论》的译稿最早即曾在《国闻汇编》发表。1898年9月14日严复觐见了光绪帝，然而他的命运并未因此改变。在此之前，曾有人参奏他在天津办《国闻报》时“借外人为护符”（按，该报有日本人参与），皇帝因而怀疑他“与外人勾串”，后来经北洋大臣王文韶（1830—1908）调查，表示“实未闻有勾串情事”，皇帝才释怀。^②无论如何，严复在受光绪帝召见后，并未蒙受恩宠，仍在水师学堂任职。他在戊戌变法中，除了在《国闻报》上呼吁改革之外，没有参与以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为首的变法维新之活动。

在天津的二十年间，严复的仕途限于水师学堂，而无法更上层楼，进入统治阶层的核心，这和他缺乏科举功名有直接的关系。在严璩所写的《侯官严先生年谱》中，谈到严复“自思职微言轻，且不由科举出身（当时仕进，最重科举），故所言每不见听。欲博一第入都，以与当轴周旋”。因此严复捐了一个监生，从1885年开始四度参与科举考试：1885年参加福建乡试、1888年参加顺天乡试、1889年参加顺天恩科乡试、1893年再次返回福建参加乡试。遗憾的是他在这四次考试中均名落孙山。

^① 参见孙应祥、皮后锋编：《〈严复集〉补编》，226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严复集》，558—559页。

^② 不过，较新的研究指出，日本人支持《国闻报》，确实有其政治企图，欲培养中国北方的亲日势力。有关《国闻报》与日本人之关系，见村田雄二郎：《清末之言论自由と新闻——天津〈国闻报〉の場合》，载《近きに在りて》第54号（2008），2—16页。作者指出《国闻报》确实受到日人之支持，其目的在对抗俄国，并培育在中国北方的亲日言论基地。见14页。

当时有一些师友对严复未能获得功名，因而受到歧视，无法大展长才，感到愤愤不平。郑孝胥（1860—1938）曾说“严书满天下，身世尚相弃。吾侪怀不平，扼腕定谁冀”。大力抨击科举制度、主张“废科举，兴学校”的吴汝纶（1840—1903）也说“执事兼总中西二学，而不获大展才用，而诸部妄校尉皆取封侯，此最古今不平之事”。

严复科举失败的经验使他对八股文感到反感，他在1895年《直报》上写的《救亡决论》一文批评八股取士有三大弊病：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因而“使天下无人才”。这无疑与其科举失败的经验有关。严复怨恨科举的情结至1909年、1910年才略为纾解。1909年底，由梁敦彦（1857—1924）、于式枚（1865—1916）、绍昌（生卒年不详）等人，考察各省表现优异的留学生，分别授以进士与举人出身。1910年初决定该次共审核通过23人，其中名列榜首的是办理铁路有成的詹天佑（1861—1919），赏给“工科进士”，其次则是严复，赏给“文科进士”，此外法政学堂总教习张康仁（1860—1926）则授予“法科进士”。严复的学生伍光建（1867—1943）、王劭廉（1866—1936）也同列文科进士。1月17日，消息传来，58岁的严复并不感到特别的高兴，据说“泊然无所动”，只写了一首诗，“平生献玉常遭刖，此日闻韶本不图。岂有文章资黼黻？敢从前后说王卢”，诗中表达了“遭刖”的痛苦经验，也谦虚地说自己的文章对国家没有什么帮助，不敢讲论排名先后。^①

严复在1893年后，显然打消了参加科考的尝试。值得注意的是，准备科举考试对严复来说，可能不完全是负面的。余英时曾指出一个“塞翁失马”的现象。他认为严复从30岁至40岁之间为准备考试而阅读经史典籍，此一功夫不失为对于运用古典文字的一种有效训练。因此严复在此十年间，有系统地沉浸于举业，使他补足了自15岁开始便中断的传统教育，“经过这一阶段，他虽然是‘半路出家’的留学生，他在中国古典文化的一般修养已与同时代的士大夫没有很大的区别了”^②。

在准备科考的同时，严复也继续接触西学。1880年至1881年间他曾阅读斯宾塞的著作，又通过像上海“别发书坊”（Kelly and Welsh Limited, Shanghai）等书店，购买了不少西书。他的个人藏书可能多达数千册，其中现存于世的还包括一套美国The Colonial Press出版的

^① 参见《严复集》，378页。

^② 余英时：《严复与古典文化》，见《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115页，北京，三联书店，2005。

The World's Great Classics 《世界经典名著》，共40册，现藏南京大学图书馆，严复在其中的Immanuel Kant的*Critique of Pure Reason*上留下许多批注），与有关西方政治思想的书籍[如现存北京图书馆的John Morley所著*Burke*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97)一书，其上注明为1902年7月所购]。这显示严复在天津时期，不但因为准备科考而具备了古典文化的修养，同时他也比较系统地阅读西方典籍，对西学有更深入的认识。

这时严复的生命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折。1894年到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遭到挫败，战争之中严复的多位同窗与学生丧命疆场，这对严复造成莫大的冲击。他领悟到中国的失败不只是军事的落后，而更有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思想方面的因素，因此必须师法西方，才能突破困境。在甲午战争期间，严复写了一封信给长子严璩，一方面感叹“时势岌岌，不堪措想”，另一方面则说根本之计唯有通晓西方的学问，才能“治国明民”，达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在战后他发表了四篇影响深远的文章，分别是《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与《救亡决论》，各文均围绕着中西文化的对比，并探讨中国积弱之由。文中他批评中国的专制、八股取士以及鸦片、缠足等恶习，提倡三项要政：“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他更积极地从事开民智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亦即翻译西书。甲午战争后不久，严复便开始从事翻译工作，其中使他“暴得大名”的作品，即是1896年至1898年翻译的《天演论》。严复首倡翻译工作的信、雅、达标准，在《天演论》的例言中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上述几句话几乎成为近代以来国人翻译工作的典范。不但如此，《天演论》出版之后，立刻轰动，成为人们喜爱阅读甚至背诵的一个经典。例如鲁迅（1881—1936）和好友许寿裳（1883—1948）就常一边吃花生米一边比赛背诵《天演论》，鲁迅还帮严复起了一个绰号叫“不佞”。^①

很多人都认为严复透过此书将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或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介绍到中国，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起了重要推动作用。这样的解释虽大致正确，然忽略了严复通过翻译在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思想之间细致的取舍，以及同一文本的

^① 参见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8~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